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法典构造

康京涛 贾庆

摘要：受限于刑法的单轨制立法模式，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在理论与实践面临着刑法前置性条款空缺、环境行刑衔接不畅等理论与实践的困局。为此，生态环境法典应当以积极刑事立法观为指导，采用附属刑法模式，直接规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在基本理念上，应当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将行为人积极履行“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将“及时采取措施”结合不同的环境犯罪类型进行细化。在罪刑条款设置上，应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先在“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专章设置一般条款，后对刑法中已有罪名进行梳理，按照污染环境类附属刑法和破坏资源类附属刑法进行规定。在构成要件上，应当对“后果特别严重”进行具体化表述，并建构类型化犯罪的构成要件。

关键词：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生态环境法典；附属刑法；罪刑条款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24)04-0112-08

一、问题的提出

“法典编纂是一系统性的表述，是以综合和科学方法，对特定国家内一个或若干法律部门诸普遍和永久规则加以组织的整体。”^[1]继202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列为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2024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力争年内提请审议。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明确提出，要“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这表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已经进入快车道。同时也意味着继2020年编纂完成民法典后，我国将迎来第二部法典。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与核心驱动力，是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法典化与体系化的关系。为实现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化，生态环境法典需要对生态环境责任做出合理安排。于此情景下，作为生态环境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应否以及如何生态环境法典中设置，是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关于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入典的讨论集中在入典模式，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在生态环境法典中依照环境保护法等立法经验直接设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生态环境法典各个分编中对刑法涉及的生态环境犯罪相关罪名罪状进行细化，然后在责任编设置引致条款^[2]；三是在法律责任编对生态环

境刑事责任进行特殊规定，专门设置刑事责任一章。实践中，域外生态环境法典刑事责任规定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路径：即生态环境法典不规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和以独立附属刑法模式在生态环境法典系统规定刑事责任^[3]。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入典模式的选择，一方面受社会发展稳定性、刑法立法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制于刑法立法政策和刑法立法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4]。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现状，试图阐释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入典法理和设计路径。

二、为何入典：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的困局

我国生态环境法律通常以“转致”条款来规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刑法相关规定。这种制度安排无法避免“转致”带来的弊端，面临着刑法前置性条款空缺、环境行刑衔接不畅等理论与实践的困局。

（一）生态环境刑事责任“转致”的弊端

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责任设置，由单一刑法进行规制，在其他法律法规中作原则性引致。作为最严厉的责任承担方式，这样的制度设计保持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稳定性与谦抑性，然而问题是，“转致”造成了生态环境法律责任体系混乱。

其一，“转致”无法解决责任间的“空隙”，造成行政责任虚置和刑事责任越权。刑法与行政法在适用上，应当是“出行入刑”的相互衔接关系，正确衡量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一方面可以避免处罚漏洞，编制严密法网，另一方面能够做到轻重有别，保障人权^[5]。然而，现实中刑事责任往往越过行政责任直接进行制裁。例如，2016年河北李荣庆马戏团案，一审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李荣庆10年有期徒刑，二审以法律已修改、运输动物出县境不再需要许可为由判决李荣庆无罪。这一案件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过往类似情形多为行政处罚而这一案件却为十年的重刑，法律适用不统一；二是运营马戏团证件过期究竟是否需要动用刑法来使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与生态环境行政责任在刑事

犯罪与行政违法的“质”的判断上无法明确剥离，在“量”的把握上没有严密的阶梯式制裁体系。而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则是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一元化立法无法做到与生态环境行政责任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如果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入典，在同一条文下，直接规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与生态环境行政责任，可以化解生态环境行政责任虚置的问题。

其二，“转致”会造成责任间的过度结合，违反比例原则，不利于保障人权。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涉及行政执法、民事索赔与刑事责任的“公私并行、六诉并存”问题^[6]。这一结构的制度安排会导致如果行为人的环境违法行为后果严重，触犯多部法律将会出现行政按日计罚与民事损害赔偿、刑罚制裁的法律责任聚合，出现责任过度承担的问题。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法律责任的功能包括惩罚、补偿和预防。理想状态下，三大功能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并且介于环境法律责任的特殊性应当侧重于补偿与预防，但实际上附带预防犯罪目的的风险刑法、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责任、惩罚性赔偿等民事责任，使预防、惩罚和救济功能并未按照原有制度规划进行细致精确划分，反而融合交叉并存成为常态^[7]。这一过度竞合可能会导致过分注重了“惩罚”功能，忽视了生态环境本身的修复与保护，而且行为人的过度承担责任也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保障责任人的合法权益，也割裂了生态环境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二）刑法前置性条款的空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在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中共设立16种罪名，具体的表述空白罪状占比较高，其中在构成要件上使用“违反国家规定”的有4款条文，使用“非法”的有1款条文，还有7款条文直接采用的是违反具体法规。空白罪状要求在刑法中对于构成要件的某些要素要援引其他法律、法规等进行判断，以补足构成要件的完整性^[8]，使刑法条文简洁流畅、避免了冗余同时保持了刑法的相对稳定性。然而，这样的大一统刑法模式使得罪行确定原则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面对环境风险下生态环境犯罪的认定，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

首先，《刑法》前置性条款的空缺会导致行

为规范与裁判规范的割裂，造成罪刑条款模糊化。生态环境犯罪条款大量采用空白罪状，使得条文行为规范简单化、抽象化。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将行为规范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与之相对的是，刑法将故意杀人罪的行为规范表述为“故意杀人的”。作为自然犯，故意杀人罪并不需要清晰明确地表示何为“故意杀人的”，因为作为社会的一般人都知道不能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但是环境犯罪属于法定犯，其前提是要先设置禁止规范、命令规范，也就是要先描述行为规范的具体内容，然后才去描述裁判规范^[9]。因而，现有生态环境犯罪条款对于行为规范的模糊规定，造成了与裁判规范的脱节。

其次，《刑法》前置性条款的空缺会制造盲点，不利于生态环境犯罪治理的普及与预防。如果前置法的普及、适用或执行不规范存在适用盲点，将造成对行为人行为是否违法判断上的失效^[10]。作为生态环境犯罪新增罪名，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目的是为了了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外来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的严重破坏与巨大压力，但此款新增条文作为法定犯所面对的行为人可能常常欠缺前置法的“违法性认识可能”。在法定犯中，行为人没有以及不能认识到自己行为违法性的现象十分普遍，而我国长期持“不知法律不能免责”的立场对法定犯进行定罪，导致了普通民众对判决结果合理性乃至合法性的质疑。实际上，行为人之所以会受到刑事制裁，是因为违反了行政前置法相关规定，并非《刑法》直接规定。于此情形下，对于行为人的刑事制裁并未起到很好的社会示范效应，反而招致社会争议。

(三) 环境行刑衔接的不畅

与自然犯相比，生态环境犯罪作为行政犯具有典型的行政违法性特质。自然犯除亲告罪以外，由司法机关直接立案、侦查、起诉，对犯罪事实的认定严格限制在刑法当中，而生态环境犯罪在追诉犯罪时必须从行政违法性进行第一次判断，否则将无法进入刑事违法性的第二次判断^[11]。事实表明，将行政犯规定在刑法中，导致了行政规则与刑罚规范相分离，并不利于预防犯罪，也有损其他法律的权威^[12]。生态环境犯罪的双重性质叠

加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与刑法规范之间在生态环境犯罪问题上条文的割裂是行刑衔接不畅的根源，由此引发了行刑之间的诸多矛盾。

一方面，从执法主体来看，行刑不畅加剧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执法难度与空隙。《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2017)第5条对行刑衔接做了一般规定：“环保部门在查办环境违法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应当核实情况并作出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书面报告。”根据此款条文可以推导出，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首先由生态环保部门等进行查处，当生态环保部门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后再移交公安司法机关。由此，行刑衔接的第一个问题出现在“发现涉嫌生态环境犯罪案件”。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生态环境保护队伍得到了重点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刑法条文随着当前人员素质的提升与培训意识的加强有较高识别能力，但是相较于“公检法专业法律队伍”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与办理法律疑难案件仍显不足，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未直接规定“犯罪与刑罚”的方面。具体而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违规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不是传统生态环境犯罪罪名，却在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过程中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也未以“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此时，生态环境部门对于此类“牵连犯罪”，由于法律条文的割裂与空白，会在案件先期处理上出现处罚漏洞，造成遗漏犯罪。

另一方面，从守法主体来看，行刑的不畅对司法判决的统一适用度提出了挑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保护法》为例，其第39条和第40条规定对拒不停止开采或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由此看来，违反矿产资源保护法达到犯罪程度是刑法能介入的第一个前提，存在“拒不”情形是第二个前提。然而，《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和《关于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惩处盗采矿产资源犯罪的意见》(2022)这两份文件跳脱“拒不”，规定在没有“拒不”行为的情况下

可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保护法》也并未删减“拒不”二字,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对当事人的刑罚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条文框架内,“违反矿产资源保护法规”当属于罪刑法定原则限制的框架内,从事相关行业人员“通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保护法》后对“拒不”进行了法律确信,而两部法律的行刑不畅最终导致形成了真空地带,造成了守法者的误判。

三、何以入典:积极环境刑法立法观与附属刑法模式

我国当下所采取的单一刑法模式,只是一种事实,不能因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此前的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纳入刑法,就肯定单一刑法模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13]。考虑到我国当前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期的背景,在积极刑事立法观的快速推动下,采用附属刑法模式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无疑是最合适的一种制度选择。

(一)积极生态环境刑法立法观之提倡

风险社会视阈下,新的风险、新的犯罪不断涌生。面对风险,立法者不可能像金字塔一样保持沉默,更不可能视而不见^[14]。为此,安全成为刑法的首要价值,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上就会秉持积极刑法观,主张通过积极预防主义,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预防与惩治犯罪^[15]。积极刑法观以刑法需要保护的重要法益为出发点,以增设新罪为直接方法来遏制犯罪风险与处罚漏洞,在辩证统一下做到“适度犯罪化”,以达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效果。

在1979年旧版刑法中并未设立专门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章节,且只设立了盗伐、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以及非法狩猎罪等少量罪名,其余少量生态环境犯罪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方式规定。同样在1979年,中央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迈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脚步。在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与社会生活领域天翻地覆的变化下,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生态环境领域的破坏急需治理。我国当前处于一种双重社会转型期,这种双重社会转型期表现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面向并存,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多元属性交织^[16]。这使得强调损害防止的现代性和

强调风险预防的后现代性同时对环境立法提出要求,从而发生了观念与制度上的“碰撞”,陷入了环境立法新旧交织的层层漩涡^[17]。因此,环境法既需要对传统的环境问题(资源、生态、环境等)进行回应,又亟待对生物基因安全、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核危机等后现代环境风险进行规制。

面对环境风险,生态环境领域通过立法来进行加码以应对环境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基本修订了一遍。从修订内容来看,依然以民事、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仍然采用“转致”条款。由此看来,随着生态环境立法不断增多,《刑法》面对环境风险不能避而不谈,必须要进行回应。要应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生态环境犯罪风险,需要寻求“积极立法观”作为立法理念的最大公因数^[18]。然而,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刑法》不但要回应生态环境的风险,而且也要回应其他社会问题,这难免会造成刑法的“宽泛化”。刑法分则当前共设十章,生态环境犯罪是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属第六节,未来生态环境犯罪的具体类型将会不断增加,但限于章节安排刑法必然有所节制。这俨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不相匹配。为此,必须以编纂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以积极立法观为指引,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

(二)附属刑法模式之主张

附属刑法,即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19]。我国第一部《刑法》于1979年颁布,囊括了所有罪刑规范,是一部统一的《刑法》。为了适应社会转型和惩治犯罪,自1981年至1997年刑法修订前先后颁布了25部单行刑法,并且在产品质量法、计量法等107部经济、民事、行政、军事、环境与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法律中附设了刑事条款(附属刑法)^[20]。自此,我国形成了刑法、单行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局面^[21]。1997年修改刑法之时,考虑到附属刑法规范之间,以及附属刑法规范与1979年《刑法》之间体系性不足、相互不够协调,附属刑法的立法模式被摒弃。由此,我国进入统一刑法时代。近年来,随着刑法修正案的频繁出

台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与刑法再法典化的呼吁,设置刑法、附属刑法、特别刑法的三元结构^[22]已经成为学界新议题,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23]。实践中,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打造生态环境附属刑法在域外已有成熟先例。目前,《法国环境法典》《意大利环境法典》《瑞典环境法典》等均采用环境附属刑法模式并取得显著效果。我国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可以缓解刑法压力、释放生态环境法典打击生态环境犯罪的能量。

一是生态环境附属刑法可以保障刑法的稳定性。环境风险的变异性带来的刑法风险时刻挑动着刑法的“神经”。在2019年深圳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一案中,一审贺建奎以非法行医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由于当时刑法并未规定生物基因方面的专门罪名,对于贺建奎非法行医罪的认定有“类推”之嫌,但是贺建奎严重挑战人类道德伦理底线,刑法必须以超脱法律的理由去予以制裁。之后,2020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才弥补了相关漏洞。同样,近年来“吃野味”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也迫使刑法作出回应,《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类型尚处于发展阶段,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生态环境犯罪行为以及科技的快速迭代,单一刑法治理明显不足。以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为契机,将生态环境犯罪从刑法剥离,在生态环境法典中规定生态环境附属刑法规范,打造行政犯与自然犯治理二元体系,对于保障刑法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生态环境附属刑法可以促进生态环境法典的可达性^[24]。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刑法是“最狭义”的法律,对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诸如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民众深谙自然犯其中之道自然避而远之。而行政犯常常与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相伴,法定犯将不违背人类基本道德的且纯属行政管理或社会规制需要的一些内容扩展进了刑法的范畴^[25]。生态环境领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远景目标使得人与环境密不可分,单一刑法模式对于生态环境从业者尚有间

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虽然直接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单纯的引致性条款却并未直接规定或者指向相应的条文,使得相关生态环境从业人员根本无法从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中对自身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有所认知,社会大众更加茫然无措^[26]。生态环境法典一旦出台,在网络与生活中,社会公众的第一认知以此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法律宣誓性文件。如若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直接规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必定会增强生态环境法典的关注度与适用性,生态环境犯罪的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将会在生态环境法典传播中化解。于此背景下,生态环境从业人员可以更好的寻法、用法,民众也可以更好地学法、守法,这无异既是一次法律改良,又是一次普法教育。

四、如何入典: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生态环境法典表达

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不仅需要既有的刑事规范进行立改废,还要明确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律责任中的体系地位,更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刑事立法理念,要实现生态环境法典形式外观系统性、制度编排合理性、程序运转顺畅性、逻辑关联自治性、结构内容开放性和法律体系稳定性^[27]。因而,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需要着眼于基本理念、罪刑条款设置、构成要件三个方面。

(一)基本理念: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起始于刑事犯罪领域,体现在生态环境领域就是在环境资源受到破坏的情况下,通过司法机关的介入,依法追究破坏者的责任,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以恢复和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和平衡^[28]。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刑罚成为最终环节。然而,刑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环境犯罪惩罚最优化的目标是实现对犯罪人的惩罚及对受害人和受害环境的修复,单纯通过刑法来惩罚环境犯罪不能实现对受害环境的修复和受害人的补偿^[29]。因此于生态环境而言,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入典必须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将行为人积极履行“修复生态环境责任”,规定为环境犯罪的减免处罚事由。

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因地制宜,积极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于生态环境犯罪的治理中,创造出各类型、多元化、针对性地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例如碳汇认购、增殖放流等。但是,由于缺乏国家层面以立法形式的统一规定,存在适用率低、局限于具体罪名、个案适用措施不统一等问题,生态环境犯罪修复性司法乱象丛生^[30]。并且当前恢复性司法法律性质尚不明确,将其纳入刑法明确为一种非刑罚措施或将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且他人代为履行有可能会违反罪责自负原则。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大宪章”,恢复性司法理念应当运用到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明确其法律性质、制定统一标准与法律适用准则。对于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如何深入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并进行精细化设计,可以参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第5条规定:“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三百三十九条规定的行为,刚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行为人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消除污染,全部赔偿损失,积极修复生态环境,且系初犯,确有悔罪表现的,可以认定为情节轻微,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在生态环境法典中应当将“及时采取措施”结合不同的生态环境犯罪类型进行细化处理。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可以在量刑情节后增加一句:“行为人及时采取增殖放流方式……确有必要判处刑罚的,应当从宽处罚。”将恢复性司法理念以条文形式明确规定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之后,既有益于发挥其真正功效,也有利于摆脱当前使用窘境。此外,既然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意味着犯罪与刑罚均会被直接规定,那么刑罚种类的增设与创新也应当是重要议题之一。我国当下生态环境犯罪刑罚依旧以自由刑与罚金为主,恢复性司法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处罚现状的不足。《刑法》第37条规定了非刑罚处置措施,其中设定的职业禁止,对于生态环境从业人员而言职业禁止带来的违法成本远比罚金带来的违法成本“预算”要重得多,然而我国当下在生态环境犯罪领域鲜有涉及,职业禁止主要应用于经济

犯罪领域。以恢复性司法理念发展与实践为契机、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为背景,重塑生态环境刑罚体系,将职业禁止引入并增设刑罚种类,把恢复性司法落在实处形成制度。

(二)罪刑条款设置:分散与集中相结合

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立法形式,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以《法国环境法典》为代表的分散式,例如在其第一卷至第七卷中均以单章、单节或者单独条款的方式规定了刑事责任条款^[31];二是以《意大利环境法典》为代表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模式,例如《意大利环境法典》“水污染的防治”一编中,在“处罚”专设“第二节”规定了“刑事处罚”^[32]。而在其第六部分“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对于生态环境本身损害救济的法律责任条款进行了集中式规定。

从生态环境法典篇章而言,目前的环境法典专家建议稿草案由总则编、污染控制编、自然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和生态环境责任编构成^[33]。对于罪刑条款而言,现有刑法规定了十余种罪名,总体罪名较少,如若环境犯罪条款未来不会大量增加,采用集中式设置方式将其置于生态环境责任编较为适宜,可以在生态环境责任编设置“刑事责任”专章,从集中规定罪名、罪状及法定刑^[34]。然而,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一旦入典,原有的《刑法》第338条的污染环境罪必将面临着拆分的问题,存在着水体污染、放射性废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土壤污染等不同形式。刑法可以将种种细分环境污染进行“打包处理”,而生态环境法典则必须进行精细化设计。此外,光污染、噪声污染尚未入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型污染将会引发环境风险,环境法典必须要有所回应。

“法典编纂将以为法律演进创造一个永久框架和指引作为目的。它的生命力在于其前瞻性,而不是局限于一部短命的或周期性的立法。”^[35]为此,集中式生态环境罪刑条款设置无法回应生态环境犯罪,宜采用分散式与集中式相结合的条款设置模式。具体而言,在生态环境责任编设置“生态环境刑事责任”专章,先设置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的一般条款,如生态环境犯罪的判断原则、判断依据、客观要素、主观要素、行政从属性、承

担方式等，后对《刑法》中已有罪名进行梳理，按照污染环境类附属刑法和破坏资源类附属刑法进行规定。污染环境类附属刑法包含：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危险废物污染、放射性污染、光污染、噪声污染等处罚条款。破坏资源类附属刑法包含非法捕捞水产品、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占用农用地、破坏自然保护地、非法采矿和破坏性采矿、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盗伐林木、滥伐林木、破坏湿地、破坏海岛、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监测数据造假等处罚条款。此外，对于与相关条文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协同问题，应当打造阶梯化法律责任体系，将生态环境民事、行政、刑事责任以违法与犯罪并立进行构建，将刑事处罚衔接在民事、行政处罚后，构建行政违反加重犯。使得严重违法行为满足刑法构成要件直接以刑法科处，对于一些一开始以刑事案件作为立案侦查最终以不符合入罪标准而出罪的一般违法行为，在条文框架下可以降格以行政责任、民事责任追究，避免了处罚漏洞。

（三）构成要件：具体化与类型化

我国当前刑法分则存在着基本构成要件的类型性不足、加重构成要件的具体性不足的问题^[36]。《刑法修正案（十一）》加重了污染环境罪的法定最高刑，将“情节特别严重”量刑提升至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具体罗列了四种加重适用情形，但是《刑法》第339条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均以“后果特别严重”作为表述，没有一个明确的限缩范围，其最高法定刑达到了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较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量刑更高，缺乏明确性与具体性。以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为例，该罪的行为模式包含了倾倒、堆放、处置三种类型，在构成本罪的司法实践判决中，许多被告人的行为类型难以被倾倒、堆放、处置中的任何一种所界定，司法机关实际上将本罪罪状中的“处置”作为一个“口袋”，将其他类型的行为类推为“处置”，以论证其行为构成本罪^[37]。

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需要对刑法中环境犯罪条款进行立改废，需要处理好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类型化与具体化的关系。具体来

说，什么样的环境犯罪需要类型化的犯罪构成要件，什么样的环境犯罪需要具体化的犯罪构成要件。类型化的犯罪构成要件可以有效地缩小处罚漏洞，但容易“大包大揽”，并不适用所有罪名，对于处罚较轻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名，可以采用类型化犯罪构成要件。例如，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引进、释放、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具体化的犯罪构成要件虽然无法满足刑事处罚的“无死角”，但是适用情形明确具体，对于量刑偏高的重刑罪名是必要的，保障刑法的谦抑性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例如，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将行为客体限缩在农用地这一用途性质上。此外对于一些罪名罪状中“后果特别严重”的犯罪应当对具体适用类型加以明确化、精细化、确定化。需要强调的是，类型化与具体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一个条文表述上可以同时使用。比如，可以将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走私固体废物罪整合为一个罪名，以类型化犯罪构成要件进行规制同时对于量刑十年以上的“后果特别严重”进行具体化表述，以此达到“类型化”与“具体化”的动态平衡关系。

五、结语

在历史长河中，法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推动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生态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编承载着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及其追究规则体系化之功能^[38]。将生态环境刑事责任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是生态环境法典应当肩负起的责任与历史使命。面对环境风险的不确定，生态环境刑事责任入典必采取积极刑事立法观，采用环境附属刑法模式，缓解刑法压力，保障刑法的稳定性。具体构造为：一是应当坚持惩罚犯罪与修复生态并重，全面推行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9号）第5条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二是采用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罪刑条款设置方式，在各编乃至各章设置罪刑条款，使行为规则条款与刑罚处罚条款接近；三是对于生态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具体化和类型化的处理，以保证有效适用。

参考文献:

- [1][35] 让·路易·伯格, 郭琛. 法典编纂的主要方法和特征[J]. 清华法学, 2006(2).
- [2] 黄明儒, 刘涛. 论统一生态环境法典中行刑衔接条款的设置[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7(2).
- [3] 王盛航. 生态文明下环境法典刑事责任体系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24(5).
- [4] 赵秉志, 袁彬. 当代中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演进与选择[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1, 5(6).
- [5] 简爱. 我国行政犯定罪模式之反思[J]. 政治与法律, 2018(11).
- [6] 吕忠梅. 环境法典视角下的生态环境法律责任[J]. 环球法律评论, 2022(6).
- [7] 何江. 环境法律责任的法典化比较研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3).
- [8] 肖中华. 空白刑法规范的特性及其解释[J]. 法学家, 2010(3).
- [9][12][13] 张明楷. 生态环境法典的罪刑条款设置[J]. 政法论丛, 2024(2).
- [10] 焦艳鹏. 论污染环境犯罪多元治理机制构建的关键性问题[J]. 政法论丛, 2024(1).
- [11] 陈立毅. 论行政机制在污染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应用[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3, 7(6).
- [14] 张明楷. 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J]. 现代法学, 2020, 42(5).
- [15] 刘艳红. 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 安全刑法抑或自由刑法[J]. 政法论坛, 2023, 41(2).
- [16] 季卫东. 变局下的中国法治[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01.
- [17] 秦天宝. 双重社会转型下中国环境法的挑战与因应[J]. 中国法学, 2024(2).
- [18] 陈禹衡.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 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2).
- [19] 张明楷. 刑法学[M]. 法律出版社, 2021: 19.
- [20] 高铭暄. 刑法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0.
- [21] 周光权. 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J]. 比较法研究, 2022(4).
- [22] 姜涛. 刑法再法典化的法理与蓝图[J]. 中国法学, 2023(5).
- [23] 张勇. 生物安全立法中附属刑法规范的反思与重构[J]. 社会科学辑刊, 2020(4).
- [24] 彭峰. 中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困境与出路[J]. 清华法学, 2021, 15(6).
- [25] 王震. 论自然犯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 [26] 侯跃伟, 夏伟.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 39(1).
- [27] 吕忠梅.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J]. 江淮论坛, 2024(1).
- [28] 王猛. 生态恢复性司法理念在环境资源犯罪中的适用[J]. 中国检察官, 2023(23).
- [29] 王强军. 环境犯罪转型时期惩罚范围的扩张及其限制研究[J]. 法学, 2023(8).
- [30] 程红.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刑事责任的规定方式与内容[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7(2).
- [31][34] 竺效. 生态环境责任编的比较法借鉴及编纂思路[J]. 中国法律评论, 2022(2).
- [32] 李钧等译. 意大利环境法典[M]. 法律出版社, 2021: 157.
- [33] 吕忠梅. 环境法典编纂论纲[J]. 中国法学, 2023(2).
- [36] 张明楷. 日本刑法的修改及其重要问题[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4).
- [37] 刘择. 罪质与罪量: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限缩适用[J].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2023, 44(4).
- [38] 吕忠梅.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承[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4, 42(3).

作者: 康京涛,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

贾庆, 西安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谭博文